

王曼 主编

我的记者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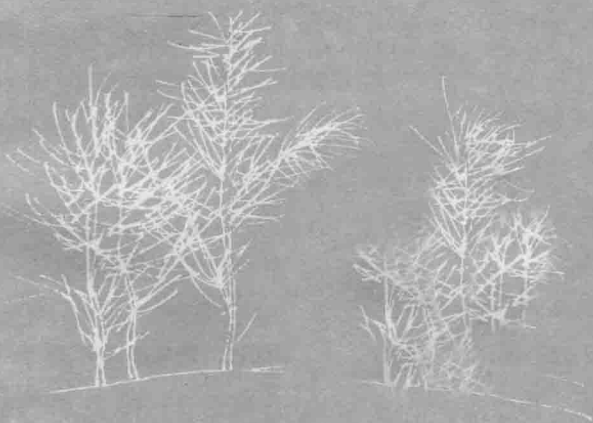
第三辑

我的记者生涯

第三辑

王 曼 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粤新登字 01 号

我的记者生涯

(第三辑)

王 曼 主编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厂址：永福路 44 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75 印张 175,000 字

1994 年 1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218—01782—7 / G · 336

定价 7.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三序《我的记者生涯》

黄文俞

《我的记者生涯》第三辑现已编成，我有义务为此说几句话。

今年仍然是“出书难”，出好书更难。《我的记者生涯》一书，依我愚见，是“通过个人的实践经验宣传党的优良传统的、行业性的、集体的回忆录”，其目的是让退出第一线老新闻工作者留下一些东西，既以资纪念，又让年轻的同仁们读了有所裨益。我看这三辑文章，均未失此意；拿来出版，也就不失为好书。正因为这样，按目前市道行情，是很难出得来的；而现在竟然接二连三出来了；这全赖新闻出版界有识之士仗义，我这个老头这厢有礼了！

这一辑文章，大都写史称“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事。在这一时期，广东的新闻事业有个跃进，办了晚报，办了农民报，办了画报，并在“双百”方针指引下有新的突破、新的创造。在新闻业务方面，对于报纸的政策宣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积累了许多经验，成为广东报纸的“传家宝”。然而这个时期的报纸，在极“左”思潮占统治地位的

历史条件下，从总体上说，其舆论导向是错误的，虽然也有曲折变化在其中。

我多次说过：报纸必须改革。但是，报纸改革是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有些人以为只要把境外、国外的一套照搬过来，便可一蹴而就，那是不能苟同的。现时报纸改革，是要解决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统一问题，解决指导性与可读性的统一问题，要达到以正确舆论引导人之目的。这些都是我所拥护的。路子怎么走，需要花力气去探讨、去实践，既要开动脑筋，更要真抓实干。而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过去几十年办报的正反经验，都是有参考价值的。割断历史，弃置传统的想法和做法，我认为是有害的。在漫长的改革过程中，必然有误区；走进误区，就有掉入泥潭的可能。这种现象事实上已有存在，就看你正视不正视罢了。

时下有一种颇为得势的浮躁之风值得注意。有人认为过去的办报经验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现在讲改革，就是要革计划经济体制的命，因而既属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就应予以推倒，好像“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样。认为报纸以及种种精神产品都只能是商品，说它们是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特殊商品则是一切“左”的错误之源，因而它们也只能以市场为导向，市场需要什么就搞什么，等等。我曾写过几百字的短文，提出问题曰：“这话又对又不对。现在社会上客观存在着一个‘人肉市场’，那么这个市场的种种需要，难道应予满足吗？”现在不是有一批人要这样做吗？呜呼！

最后，再一次为《我的记者生涯》第三辑的出版欢呼，

向支持它的出版的同志深表谢忱。至于出版以后，人们看与不看，各各有选择的自由。我们只不过把几十年办报的经历如实地写下来，好让人们各各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来评论我们的工作。

1994年7月19日

目 录

三序《我的记者生涯》	黄文俞 (1)
回忆办报二三事	黄文俞 (1)
投入社会 攀登险峰	周晓瑾 (21)
两个突破	黄景仁 (39)
三次采访 三场考试	高 风 (49)
忆羊城晚报《五层楼下》	林 八 (55)
七径风波	莫复溥 (61)
放“卫星”那个年头	黎作骥 (72)
一次失败的采访报道	区荣光 (80)
《打开裹脚布》等文章惹来的是非	林 剑 (85)
乌纱意识的干预	陈兆川 (93)
一个记者的足迹	艾 蒲 (97)
采访高层领导获益谈	牛正武 (125)
《黄花湾的战斗》通讯是这样写成的	陈婉雯 (133)
李杰和他的小木棚	袁效贤 (140)
朝鲜前线采访所见所闻	柯 原 (147)

醉卧大草原·····	万炜明 (156)
老梢公的启示·····	彭玉最 (163)
采写我们时代的普通人·····	李春晓 (167)
一次竞争·····	孙锦常 (173)
南海采油梦成真	
——记如醉如痴的一次报道·····	王健 (178)
城市记者第一次出海采访·····	李骏 (186)
到柴达木办报·····	陈清 (190)
走向开放的世界	
——一次出访追记·····	施汉荣 (197)
我编副刊的一场风波·····	林紫 (207)
第二手材料·····	傅真 (212)
版面内外	
——忆《华商报》读者版的工作·····	吴荻舟 (221)
我在香港《大公报》工作期间·····	萧乾 (228)
两广战地采访断忆·····	白麦浪 (234)
敌后《前线报》美编生活片断·····	张超 (242)
两地三年的记者生活·····	茜菲 (249)
老报人梁若尘·····	林铃 (256)
后记·····	编者 (273)

回忆办报二三事

黄文俞

看表——现在是 1994 年元旦上午 9 时 37 分。开笔大吉。

广东“老记协”编印了两辑《我的记者生涯》，我均为之作序。自己写不出文章，写几句序言，聊以塞责，有愧同仁；然而我对编印此书，是十分拥护、支持的。最近“老记协”又为编印第三辑征稿，其着重点是“文化大革命”前 17 年，似乎非写点东西不可了。在此元旦吉日，遂尔开笔。

“文化大革命”前 17 年，我先是在新华分社工作，1954 年 2 月 26 日调进南方日报社，至 1966 年 8 月 27 日被送入“牛栏”止，一共干了 12 年半。正是往事如烟，本已忘却。现在偏要写点什么，那就得在脑海里翻搅几回，有三五片鳞片浮了上来，还觉得有可写之处。利用这个最后的机会写它出来，正好为了完全的忘却——真是一场梦！

我的回忆，从 1956 年开始。

从 1956 年开始

为什么从 1956 年开始？

答曰：因为从这时开始，我才是用自己的脑子去办报。前此的几年，只在模仿人家的样子走路，可谓“亦步亦趋”，没有自己的思想。

摆在面前的课题是：如何在报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城以后，党中央对此抓得很紧。1950 年作出了专门的决定；1954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中，有大段文字强调开展批评，说“报上的批评必须充分展开。”这可谓“三令五申”了。我的理解，党中央如此强调，旨在防止我们党在执政后腐败，防止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中，败在他们手上。为了防止腐败，就要发扬人民民主，而发挥社会舆论监督作用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真是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在报上开展批评，全国报界都有“三起三落”或“两起两落”之说，早已视为畏途，对我这个办报新丁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是年 8 月，在广东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陶铸同志在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强党的政治思想教育，要发挥报纸的效能，使它真正起到舆论监督作用。他接着说：“现在我们的报纸不敢大胆揭露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这是很不应该的。党的报纸必须真正反映群众的意见，代表群众意见，对不良现象进行斗争，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显出舆论的力量，同

时对指导工作的意义来讲，也必须全面反映情况，才能对工作有所帮助。”党委第一把手在党代表大会上讲了这番话，无疑地要引起全报社极大的震动，尤其是我。

为贯彻执行中央和省委决议，首先要解决认识问题。当时报社编委会提出：“我们的国家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翁，报纸除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反映省委的意图外，还应该让人民群众表达他们对党和政府的意见和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报纸既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既是党委的机关报，又是党所领导的社会舆论机关；既是党的喉舌，又是人民的喉舌。”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报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关系到报纸的性质和基本任务问题，因而是个原则问题了。

1956年下半年，《南方日报》不断加强了开展批评的力度，动员各部采编力量投入作战，并由号称报社第一部的党的生活部（这是从苏联《真理报》那里照搬过来的，不久以后取消了这个部）担任主力攻坚。首先第一炮是有名的“花县割麦事件”。是年春夏之交，花县狮岭乡群众来信，反映该县片面追求早造插秧进度，强迫农民把尚未成熟的小麦割掉，造成严重损失。党的生活部记者深入调查后，写成调查报告发表，批评了该县副县长和三个乡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随后不久，又发表了批评花县县委在选举中压制民主、打击报复行为的报道。这两篇报道，引起佛山地委领导的不满，到省委来“打官司”了。几次开会争辩，各执一词，也各不相让，最后决定在报上开展不同意见的自由讨论。此时，

党中央在全国展开了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主观主义的运动，报纸的批评也开展得更猛烈，好像在下倾盆大雨。这样做行不行？这时国际上发生的“波匈事件”引起我严肃地思考。我从新华总社编印的“大参考”中看到波共中央关于“波兹南事件”的一份文件说到，“波兹南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是报纸作了“煽惑性的宣传”。我们在报上倾盆大雨地搞批评，揭露阴暗面，会不会引发群众对党的不满情绪？于是，我决定减轻力度，开始“收”了。恰在这时，赵紫阳同志约我会面，作了如下对话：

赵说：“这一段报纸的批评，下面有意见。”

我说：“我已经决定收缩。我在波共中央的文件中看到，‘波兹南事件’发生的一个原因，是报纸作了煽惑性的宣传，所以——”

赵打断了我的话，说：“不，你们搞的不是。你们的批评过多、过分、过于集中，这样会挫伤下面干部的积极性。”“你们自己已经察觉了，那就好。”

谈话回来后，我决定暂停刊登批评稿件。

1957年反右派的时候，在一次地委书记会议上，一位地委书记发言提出1956年报纸搞批评的问题。陶铸同志打断了他的话，说：“《南方日报》的批评，我支持了一下。”赵紫阳同志接着说：“他们是反对三个主义（指中央发动的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主观主义）。我一讲话，他们就不搞了。”从此，再也没人提这个问题。南方日报社的编辑、记者也没一个因搞批评被错划为右派的。

一场风险安然度过，要衷心感谢陶、赵两位领导，这是我所终生难忘的。这场风险使我深刻体会到，在报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个原则问题，但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必须讲究方法，才能使报上的批评得以正确地、充分地、经常地开展。一句话：坚持原则，讲究方法。而这是待到1960年《随行纪谈》发表后才得到初步解决的。

“晚报特点”

1957年，南方日报社创办了《羊城晚报》，这是广东报业史上一件大事。此时，广东新闻界多了一句行话：“晚报特点”。到了现在，这句话已经很少听到了。

《羊城晚报》是怎样办起来的呢？

筹办经过很简单。1957年1月，党中央正式提出了“双百方针”。4—5月间，广州文化界人士在“鸣放”会上向省委提议：仿照北京《光明日报》那样，在广州办张晚报作争鸣园地。陶铸同志接纳了这个建议，把任务交给宣传部。宣传部拟定：交由民主党派去办。正在议论间，来了反右派运动，民主党派头面人物多数陷入批判围城之中，筹办晚报之事只能搁起。7月间，正值反右派达到高潮的时候，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匡同志找我谈话。

王说：“省委决定，晚报交你们南方日报去办。”

我有点恼火，回答说：“你过去叫民主党派办，我是不赞成的。现在交南方日报办，我一定把它办成！”

交谈有点不欢，仅两句就结束了。

8月间，王匡同志找杨奇同志谈话。杨回来传达说：“王匡同志限令晚报在10月1日创刊。”能不能办到？当时报社已酝酿过办晚报的蓝图，心中是有点数了的。李超同志说：“现在关键是人，把人集中起来就好办了。”于是我下命令抽人。当时南方日报办公室主任以及各部主编、主任一级人员共24人，抽出去办晚报的共11人，差不多占了一半，而且都是“写手”、“快手”，笔头比较尖、比较活的，因为晚报主要刊登当天采写的新闻。果然，10月1日，《羊城晚报》诞生了！完成了省委交给我们的任务。论功行赏，我以为李超同志和杨奇同志并列第一，都应发给金牌，而我只不过在策划上起了点作用而已。

在反右派运动高潮中下令筹办晚报，以为“争鸣”提供园地，这是出乎许许多多人意料的事，为此，我深佩陶铸同志的胆略。至于我们这些执行者能如此坚决地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把它办成，首先因为我们那时认为，“双百方针”是毛主席倡导的，是繁荣科学、文化的基本方针，是个长期不变的方针；至于右派分子利用“鸣放”反党，那不过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而已。

新出世的《羊城晚报》，同《南方日报》的面目大异，这因为当时陶铸同志说过，晚报一定要有鲜明的特色，如果办成“《南方日报》第二”，那就不如不办了。他还说：“社会主义报纸可不可以办得多种多样呢？我看是可以的。”“我们教育人民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文章写得风趣，不一定没有

马克思主义。”“晚报特点”之说，由此而生。为造就这种特点，他还给了我们一些“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如对新华社稿件可灵活处理，无须承担指导工作任务等。如果上级没有这些指示和措施，要想把晚报办成这个样子，可以断言：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其时正是极左思潮大盛之日，一张有自己特色、大异于党委机关报的报纸出现，不可避免要引起姓“社”姓“资”的争论。为回答这个问题，我杜撰了一个名词说，《羊城晚报》是“社会主义报纸的一个流派”。我说的“流派”乃是对“正宗”而言，晚报虽不是“正宗”，但它姓“社”不姓“资”。省委一位政法书记一次专门找我谈话，说他从江门等地回来，看到那里的工人都喜欢看《羊城晚报》，不看《南方日报》。以后晚报不要发行到中小城市了。我漫应之曰“哦，哦。”心里想，我还是执行陶铸的。

广大群众对晚报是热烈欢迎的。在筹办时，我们作过“市场预测”，认为晚报不在公费订报之列，看晚报得掏腰包；晚报既决定以文教界为读者对象，为数有限；因而估计充其量不超过日产5万份。可创刊之日，到街上一看，读者并不限于“文人墨客”，大多是“贩夫走卒”。三轮车工人在等客时，车子摆在路边，自己就在那里看晚报。当天发行量11.4万多份，超过预测一倍多。以后发行数字逐日增加。出报的时候，个体报贩边跑边喊：“羊城晚报！羊城晚报！”全城震响，盛况空前。《羊城晚报》自诞生之日到现在的30多年间，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的“金棍子”姚文元一棒打为“造谣、放毒的旧报纸”，死于非命之外，哪有一天受

广大群众冷落过？由此可见这种类型的报纸，符合群众需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究竟《羊城晚报》有什么特点？我时常感到，我们“老南方”这批人有个很大的缺憾，就是具有做实事的长处，一年365天，天天夜以继日做工作，而没有静下来细细思量，总结经验，形成一些带理论色彩的观点以指导实践，是以说起“晚报特点”究竟是什么来，我自己就说不清楚。谈几点感想供同行参考参考吧。

我以为《羊城晚报》在总体规划上，较多批判继承传统，很少苏联模式影响，这是个特点。解放初期的那几年，全国报界都学苏联的办报经验，而我还是学得很认真的一个，并曾照搬照套他们的具体做法，这无疑是要失败的。碰了钉子后逐步改变过来，但仍在不少方面存有他们的影响。在筹办晚报的时候，我却反其道而行之，专门向解放前办过报的“老报人”请教。这因为，按现时的说法是有点“商品意识”、“市场观念”，必须考虑报纸能否“对路适销”。南方日报社虽然早就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制度，不吃“皇粮”，但有公费订报作支持，能自给有余。现在办晚报，当然也是自负盈亏，非赚钱不可。邬维梓同志献计说：解放前办报的主要经验是“新闻主攻，副刊主守”，搞好新闻报道借以扩大读者，办好副刊借以巩固读者。我采纳了他的建议，以一、四版登新闻，二、三版办多个副刊、专刊（栏），一半对一半。几十年来，晚报面貌虽不断有变化，但是好比建房子，其框架结构没有变，改变的是房子内部间隔、装修与室内装

饰而已。足见这种规划合乎读者要求，合乎群众读报习惯，“对路适销”。至于办哪些副刊，搞什么栏目，大体都有所参照，大都借鉴抗战时期香港的“新潮”报纸，首先是当时的进步报纸。至于内容，那就得力求体现时代精神。这也许可以叫做“批判地继承”、“推陈出新”吧。

报纸的主体是新闻报道。《羊城晚报》的特点是抓社会新闻。社会新闻解放前早已有之，但因它几乎同“咸湿新闻”划等号，在正派人心目中是很臭的东西，是故解放后给以绝对的否定，而完全抹煞它由于接触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使报纸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长处。《羊城晚报》敢于搞社会新闻，可以说是有着“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气。最根本的一条是有了“移风易俗，指导生活”这“八字真言”作主心骨，使社会新闻能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出正确的舆论导向，帮助人们辨别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潜移默化，移风易俗，收到十分良好的社会效果。由于在新的思想基础之上，发挥了社会新闻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长处，从而使晚报深受群众欢迎，并且风行全国。把本来很臭的东西变成很香的东西，这也许可以叫做“化腐朽为神奇”吧。需要说明一点，《羊城晚报》搞社会新闻也有个过程。“文化大革命”前搞的并不太好，这是因为思想还不够解放，僵化的办报思想还在起作用。“文化大革命”后复刊，由于思想进一步解放，晚报的社会新闻，不论在广度或深度方面都上了新台阶。时至今日，几乎所有大小报纸都搞社会新闻了，那就有由香复归于臭的危险，不可不加以警惕。